从审美愉悦到伦理关怀——殷企平文学批评的建构路径

From Aesthetic Pleasure to Ethical Concern: The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of Yin Qiping's Literary Criticism

高晓玲（**Gao Xiaoling**）　马倩男（**Ma Qiannan**）

内容摘要：本文以“愉悦”为切入点，系统考察殷企平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及其现代性关怀。文章认为，殷企平在康德审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共享愉悦”概念，将愉悦从私人体验拓展为连接个体与共同体的情感机制。通过对普通读者、文学经典、共同体及公共精神等议题的持续探讨，他构建了一条从审美经验通向伦理关怀的理论路径：愉悦经由阅读实践转化为共享经验，进而生成共同体意识、责任意识与公共精神。面对现代社会的情感异化问题，殷企平重新发掘文学的公共价值，打通审美与伦理、个体与共同体、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体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批评旨趣。

关键词：共享愉悦；伦理；共同体；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高晓玲，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国文学、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马倩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英国文学。本文为2024年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19世纪英国文学的中国形象书写研究”【项目批号：2024BWX030】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rom Aesthetic Pleasure to Ethical Concern: The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of Yin Qiping's Literary Criticism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pleasure”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odernity concerns of Yin Qiping's literary criticism. It argues that, building upon Kant's aesthetic theory, Yin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communal pleasure,” expanding pleasure from a private experience into an affective mechanism that connects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Through sustained explorations of such issues as the common reader, literary classics, community, and public spirit, he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path leading from aesthetic experience to ethical care: pleasure is transform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reading into shared experience, which in turn generates communal consciousness,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public spirit.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of emotional alienation in modern society, Yin reawakens the public value of literature, bridging the gaps between the aesthetic and the ethical,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and literature and reality, thereby embodying a distinctly humanistic critical orientation.

Keywords: communal pleasure; ethics; community;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s: Gao Xiaoli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specializing in 19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Email: zdgaoxiaoling@zzu.edu.cn). **Ma Qiannan**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01, China), specializing in 19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maqiannan123@126.com).

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中，审美与伦理往往被视为两个相互区分甚至彼此紧张的领域。审美活动侧重于主体的感受与体验，其核心范畴是美、趣味与愉悦；而伦理则更多涉及责任、义务与价值判断，关注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康德（Immanuel Kant）以来的现代美学传统中，“无利害性”被视为审美判断[1]的重要特征，愉悦（pleasure）也因而常被理解为一种超越功利目的的主观感受。相应地，伦理则被归入实践理性的范畴。二者虽非绝对对立，却长期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

然而，在殷企平近年来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却看到了一条不同于上述传统划分的理论路径。他不断重返“愉悦”这一在当代文学理论中一度遭到冷落甚至误解的话题，并尝试重新发掘其深层的人文价值。他在“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一文中指出，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商品化浪潮以及某些“前卫”理论的双重作用下，不仅“快感”取代了“美感”，而且“愉悦话题变成了雷区”（90）。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讨论愉悦，不仅是一个审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和价值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殷企平对于愉悦的关注，并非停留在个体感受层面。他所强调的不是封闭的、私人化的快乐，而是一种

1 康德所谓的“审美判断”（aesthetic judgment），主要指关于美的“鉴赏判断”（judgment of taste）。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将其界定为一种建立在“无利害的愉悦”（disinterested pleasure）基础上的判断，即主体对于对象的愉悦并非源于欲望满足或功利目的，而源于想象力与知性自由和谐的活动。与此同时，这种判断又具有“普遍可传达性”（universal communicability）和“主观普遍性”（subjective universality）的特征，即当人们判断某物“美”时，并不仅仅表达个人偏好，而是隐含着他者也应当认同这一判断的诉求。参见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Eric Matth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9-123.

能够沟通个体与他者、连接审美经验与公共生活的“共享愉悦”（communal pleasure）。在他看来，从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到克默德（Frank Kermode）的文学与批评传统始终表明，愉悦不仅关乎审美判断，更关乎人类尊严与生命意义；愉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使个体获得满足，更因为它能够超越私人经验，成为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

如果说文化研究、共同体研究和普通读者研究构成了殷企平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愉悦”则是贯穿这些议题的内在线索。通过“共享愉悦”这一概念，他试图重新打通现代性条件下被不断割裂的几个重要维度：审美与伦理、个体与共同体、文学与现实。由此，愉悦不再只是文学阅读的结果，而成为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精神力量；文学批评也不再只是知识生产活动，而被赋予了修复情感联结、重建公共精神的文化使命。基于此，本文拟以“愉悦”为切入点，考察殷企平如何从审美经验出发，经由共享愉悦、阅读共同体和公共精神等环节，最终抵达伦理关怀的维度，进而呈现其文学批评背后的人文主义旨趣及其对现代性困境的回应。

一、愉悦的重构：从个人感受到共享经验

殷企平对“愉悦”的重新阐释，首先体现为对现代愉悦观的反思与纠偏。在他看来，愉悦之所以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遭遇误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逐渐被等同于消费主义意义上的快感与欲望满足。资本主义商品文化的发展，使愉悦越来越成为一种可以被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对象；与此同时，一些理论思潮又不断将愉悦政治化、欲望化，最终导致审美愉悦的传统内涵被严重削弱。因此，要恢复愉悦的理论价值，首先需要重新回答“何为愉悦”这一根本问题。[1]

对于这一问题，殷企平最为重视的理论资源来自康德。《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2000）中关于审美判断的论述，为他理解愉悦提供了重要基础。康德认为，美是一种“普遍可传达的愉快感”，其特点在于“不带任何利害”（Kant 89-90）。一般认为，这种无功利性往往被视为审美经验远离现实生活的证明。然而殷企平指出，康德真正重要的贡献并不在于强调审美经验的私人性，而在于揭示了愉悦所具有的普遍可传达性。[2]也就是说，审美愉悦虽然发生于个体主体之中，却并不封闭于个人感受。当人们判断某物“美”时，他们不仅是在表达自身的感受，也隐含着一种期待：他人同样能够理解并分享这种感受。审美判断由此天然包含着面向他者的维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殷企平发现了愉悦通向共同体的理论契机。如果说消费主义意义上的快感以个体满足为目的，那么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愉悦则天然指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认同。它所强调的不是占有对象所获得的满足，而

1　参见 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外国文学》2（2024）：93-94。

2　参见 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外国文学》2（2024）：99。

是在共同感受中生成的精神联结。由此，愉悦不再只是主体内部的心理状态，而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情感经验。

殷企平反复强调“普遍可传达性”，并不是为了重新阐释康德，而是试图借此回应现代社会日益加剧的情感断裂问题。在消费逻辑和工具理性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即时快感，却越来越难形成深层的情感共鸣。康德关于审美愉悦“普遍可传达性”的论述因此重新获得现实意义。按照康德的理解，人们在作出审美判断时，不仅表达自身的愉悦，也期待他人能够分享这种愉悦；这种以“共通感”为基础的可传达性，表明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超越利益交换和身份差异的理解与沟通的可能。[1] 正是在康德“普遍可传达的愉快感”理论基础上，殷企平进一步提出“共享愉悦”概念。与康德主要关注审美判断中的主体间关系不同，殷企平将“可传达性”推进为“共享性”，并将其扩展为共同体建构的情感基础，从而赋予这一概念更鲜明的现实关怀和人文主义内涵。在“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中，他批评了 20 世纪后期盛行的去经典化思潮，指出文学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而持续发挥影响，并不仅仅因为制度、权力或意识形态的运作，更因为其能够不断激发读者的审美愉悦。[2] 这种愉悦不是孤立的个人感受，而是一种能够被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反复体验和共同分享的情感经验。经典作品的生命力，正来源于这种持续生成并不断传递的共享愉悦。

这里实际上蕴含着殷企平对于文学价值的一种再理解。与强调权力生产的经典理论不同，他更关注文学作品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联系。在论述克默德时，殷企平特别强调华兹华斯关于愉悦问题的思考。[3] 华兹华斯不仅将“给他人带来即时愉悦”（give immediate pleasure）视为诗歌的重要使命，而且进一步把愉悦提升为人的基本生命原则。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他将愉悦称为“伟大的、基本的原则”（the grand elementary principle of pleasure），认为人正是凭借这一原则“认识、感受、生活和行动”（knows, and feels, and lives, and moves）（Wordsworth,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308）；而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则进一步指出，愉悦构成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 [4]。殷企平显然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在他看来，愉悦之所以值得捍卫，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生命中最基本也最珍贵的部分——愉悦关乎人类尊严，关乎生命的奥秘。[5]

因此，“共享愉悦”不仅是一种审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实践。它使文

1　参见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Eric Matth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6-104.

2　参见 殷企平：“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东吴学术》6（2023）：26。

3　参见 殷企平：“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东吴学术》6（2023）：27。

4　参见 Lionel Trilling, “The Fate of Pleasure,” *Beyond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Learning*,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5, 58.

5　参见 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外国文学》2（2024）：95。

学超越个人娱乐功能，成为连接个体与他人、过去与现在的重要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殷企平对愉悦的重构，实际上是在重新寻找现代社会中日渐弱化的情感联结方式，而这也构成了其进一步讨论共同体、普通读者与公共精神问题的理论前提。

二、阅读作为实践：共享愉悦的生成机制

“共享愉悦”的提出，使审美经验获得了超越个体层面的公共意义。然而，共享并非天然存在，而需要通过特定的文化实践得以实现。审美愉悦如何从个人感受转化为共同经验，并最终生成共同体意识？对于这一问题，殷企平将目光投向了文学最基本的活动——阅读。

在“普通读者”一文中，殷企平重新梳理了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伍尔夫（Virginia Woolf）、克默德等人的普通读者传统。他指出，自 20 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不断走向专业化和学院化，理论话语日益复杂，文学批评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知识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普通读者越来越被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然而，文学批评一旦失去普通读者，其公共基础也将随之动摇。因此他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判断：“普通读者的消失，标志着文学批评的异化”（46）。所谓“异化”，并不是说文学批评失去了学术价值，而是指其逐渐偏离文学批评的根本旨趣。正如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所言，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一切旨在界定、分类、分析、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研究活动”（Abrams 49-50）。当文学批评越来越成为少数专业研究者之间的知识生产，而与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相脱节时，其公共属性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

殷企平认为，普通读者不仅是文学作品的接受者，也是文学意义生成的重要参与者。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在创作完成时便被一次性确定，而是在作者、文本与读者持续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正是在不断的阅读、理解与阐释过程中，文学作品获得新的生命。因此，普通读者不仅构成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基础，也构成文学公共性的根本依托。[1] 这种对普通读者及其阅读动机的理解，与其关于“共享愉悦”的理论形成了内在呼应。在伍尔夫那里，普通读者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为了自己的愉悦而阅读”（read for his own pleasure）（Woolf 11）。殷企平重视这一表述，因为它触及文学阅读最原初的动力。阅读首先不是为了获取知识、完成任务或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出于对文学本身的热爱与愉悦。然而，在他看来，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并非“读者为何获得愉悦”，而是“愉悦为何能够被分享”。

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他引入了“共享愉悦”的概念。在“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中，殷企平重新讨论文学经典的形成。长期以来，关于经典的研究往往强调教育体制、文化资本和权力体系的重要作用。从经典形成史来看，这些因素当然不可忽视，但如果经典只能依赖外部力量维系，那么许多

1　参见 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普通读者”，《外国文学》6（2019）：53。

作品早已随着时代变迁而失去生命力。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一些作品能够跨越数百年乃至更长时间持续被阅读、讨论和传播。[1] 对此，他借助克默德的经典理论指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持续不断地激发读者的愉悦。更进一步说，经典作品所创造的并非孤立的个体愉悦，而是一种能够被不同读者反复体验和彼此分享的“共享愉悦”。[2] 经典研究的观察角度也由此发生了转变。经典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承载着文化传统，也因为它保存着跨越时代的人类共同情感经验。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虽然生活境遇各异，却能够在阅读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华兹华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或艾略特（George Eliot）时产生相似的感动与共鸣。正是这种不断被重复、传播和再生产的情感经验，使经典获得持续生命力。因此，阅读并不是孤立主体面对文本的私人行为，而是一种进入共同经验世界的过程。

共享愉悦之所以能够超越个体经验并形成共同体意识，关键还在于阅读所创造的特殊沟通方式。在讨论共同体问题时，殷企平特别强调“深度沟通”（deep communication）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并不缺乏信息交换，却越来越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情感交流。文学阅读的价值正在于，它能够突破日常生活中功利性和工具性的交往模式，使人进入更深层次的人际理解之中。通过阅读，个体得以分享他人的经验、理解他人的情感，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超越现实边界的共情（sympathy）能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作品不仅是审美对象，也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史料”，保存着特定时代人们对于爱、痛苦、希望、失落、责任等情感经验的理解方式。阅读这些作品，实际上也是进入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情感对话过程。读者不仅与文本中的人物和故事发生联系，也与过去时代的人们建立起精神上的沟通。[3]

在“英国文学中的共享愉悦与共同体形塑”中，殷企平进一步指出：“共享愉悦是共同体的一块重要拼图”（42）。这一论断实际上揭示了阅读与共同体之间的深层关联。传统共同体理论往往强调血缘、地缘、制度或利益关系，而殷企平则将共同体更多地理解为一种情感结构的生成过程。在他看来，共同体之所以能够维系，并不仅仅因为人们生活在同一空间或遵循同一制度，更因为他们分享着某种共同的情感经验。文学阅读所创造的共享愉悦，正是这种情感经验的重要来源。进一步说，阅读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能够带来审美享受，更因为它能够促成经验的交流与情感的共享。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入他人的生活世界，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物和思想发生联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对于他者处境的理解与感受。通过阅读，私

1　参见 殷企平：“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东吴学术》6（2023）：27-29。

2　参见 殷企平：“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东吴学术》6（2023）：33。

3　参见 殷企平：“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5）：80-81。

人感受被不断转化为共同经验；通过共享愉悦，陌生个体之间形成超越现实边界的情感联结；而这种联结又进一步构成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重要基础。

由此可见，在殷企平的理论框架中，“普通读者”“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概念，而是构成一个相互支撑的整体。普通读者是共享愉悦的接受主体，文学经典是共享愉悦得以持续生成的重要载体，而阅读则是连接二者的实践过程。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持续发挥影响，不仅因为其审美价值得到制度确认，更因为它保存并传递着人类共同的情感经验。阅读经典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进入共同经验世界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情感交流与经验传递中，文学成为连接个体与共同体、过去与现在的重要纽带。因此，在殷企平的理论视野中，阅读不是单纯的审美消费活动，而是一种具有公共意义的文化实践。它不仅使个体经验获得共享的可能，也使审美感受逐渐转化为理解他人、关怀他人的能力。在这一意义上，阅读成为沟通审美经验与伦理关怀的重要中介，并为后文讨论责任意识的生成提供了基础。

三、责任的生成：愉悦如何内化伦理

阅读使共享愉悦成为可能，但共享愉悦并非文学经验的终点。由此还需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最终将把人引向何处？殷企平的回答并未停留于审美经验本身。在其关于共同体、共享愉悦与公共精神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辨识出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愉悦不仅是文学经验的起点，也是伦理生成的重要契机。共享愉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能够创造情感联结，更因为它能够促使个体超越自我中心，进入理解他人、关怀他人并承担责任的伦理关系之中。殷企平的重要贡献正在于，他没有将伦理视为附加于审美经验之上的外在要求，而是着力揭示审美经验内部所蕴含的伦理潜能。

在殷企平看来，现代性不仅改变了人们追求幸福的方式，也重塑了幸福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个人幸福与伦理责任逐渐被切割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幸福指向个体满足，责任则被归入外在规范。在研究奥斯丁（Jane Austen）的小说《爱玛》（*Emma*, 1815）时，殷企平指出，现代幸福观的重要变化之一就在于其认知维度与伦理维度的分离：“幸福观念的认知维度和伦理维度开始分道扬镳”（“《爱玛》中的反讽与幸福哲学” 28）。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奥斯丁小说中的人物世界，也揭示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处境。当幸福越来越被理解为个人体验和私人满足时，责任便逐渐被视为对个体自由的限制；当个体不断退回私人生活领域时，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联系也随之削弱。其结果是，个人幸福与公共关怀被割裂，自我实现与责任承担被置于彼此对立的位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殷企平重新讨论愉悦问题。他的目的并非重申审美的自主性，而是试图借助审美经验，重建现代社会中已经疏离的幸福与责任、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联系。

对殷企平而言，文学通过审美经验改变个体理解世界和他人的方式。阅读优秀文学作品时，读者不断进入陌生人物的经验世界，在情感认同与想象参与中体察他人的欢乐、痛苦、希望与失落。这一过程以审美参与和情感分享为起点，其更深层的意义则在于共情能力的形成。对于文学何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文学的审美是非功能化的，它主要是通向和实现教诲功能的途径”（聂珍钊 71）。这一判断为理解殷企平的思路提供了参照：审美并不排斥伦理，反而可能成为伦理意识生成的中介。文学正是通过审美体验而非直接说教，激发读者对他人处境的感知与理解。正如华兹华斯在《丁登寺》（“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1920）中所写，那些曾经带来宁静的感受，会重新唤起已经忘却的愉悦；而一个良善之人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往往来自那些“早已忘记、却饱含着善意和爱的无名小事”（little, nameless, unremembered acts / Of kindness and of love）（Wordsworth, “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126）。在华兹华斯那里，审美经验并不止于感官愉悦，而会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对他人的善意与关怀。文学所培育的，正是这种体察他人处境并回应他人需求的能力；责任意识也在这一渐进的情感塑造过程中逐渐形成。因此，共情构成了共享愉悦通向伦理责任的重要中介。责任的生成并非始于对抽象道德原则的接受，而是始于对他人处境的感知与理解。当读者进入文学作品所创造的经验世界时，他们不仅分享人物的情感体验，也不断学习从他人的视角观察世界。通过这种情感参与，个体逐渐意识到自身与他人的关联，责任意识也由此从外在规范转化为理解并关怀他人的内在自觉。在此意义上，共享愉悦不是伦理发展的终点，而是伦理意识得以生成的情感基础。

当这种对他人的感知与关怀超越个体之间的情感联系时，便进一步指向共同体的建构。殷企平关于华兹华斯的研究，集中呈现了审美经验、情感联结与共同体生成之间的内在关系。殷企平指出，华兹华斯所处的时代正经历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传统的乡村共同体正处于土崩瓦解的境地，而新型的共同体还未出现”（“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 79）。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华兹华斯持续思考共同体重建的问题。他没有诉诸制度设计或政治方案，而是试图通过诗歌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历史之间的深层联系。在阐释华兹华斯的共同体观时，殷企平特别借助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理论，指出“情感结构意味着一种‘深度共同体’，而只有在这深度共同体中，‘沟通才成为可能’”。[1] 由此可见，华兹华斯所追求的共同体并不是建立在利益纽带基础上的社会组织，而是一种以情感沟通为基础的共同生活形态。在这种共同体中，共同的情感经验与价值认同构成维系人与人关系的重要基础，也促使主体摆脱封闭

1 参见 殷企平：“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5）：80。

的自我中心状态，意识到自身与他人的相互依存。

因此，在殷企平的理论体系中，共享愉悦不是共同体的附属品，而是其生成的重要条件。他一方面明确指出“共享愉悦是共同体的一块重要拼图”，另一方面也借博伊森（Rowan Boyson）的观点指出，“共同体情感也会产生愉悦”。[1] 这意味着愉悦与共同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共享愉悦推动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而共同体情感又不断强化共享愉悦。二者的互动使审美经验超越个体感受，逐渐转化为对于他人的理解与关怀，并为责任意识的生成提供情感基础。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并不是这一过程的终点，它还进一步指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殷企平未将文学的伦理作用停留在情感联结层面，而是将其延伸至公共精神问题。在“走向公共精神：伊格尔顿的趣味观”中，他特别关注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于趣味与公共性的讨论。长期以来，趣味常常被理解为私人偏好和个人选择，但伊格尔顿认为，真正的趣味并非封闭于个体内部的主观好恶，而是一种能够联结个体与共同体的情感能力，蕴含着通向共同感受与公共生活的可能性。正如殷企平所引述的那样，“趣味、情感和舆论更雄辩地证明，让人产生共鸣的是某种普遍共同的感觉”（78）。在这里，趣味已不再只是个人趣好的表达，而成为连接个体与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审美经验之所以具有公共意义，正在于它能够使人们超越私人立场，在共同感受与相互理解中形成对于公共价值的认同。

至此，共享愉悦所指向的伦理归宿也逐渐显现出来：它从审美感受出发，经由共情能力和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最终通向公共精神与责任意识。公共精神不是附加于审美经验之外的目标，而是共享愉悦不断扩展其情感边界的结果。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给予人愉悦，更在于帮助人理解他人、认识社会，并在这种理解中形成参与公共生活的责任意识。责任也因此不再是外在强加的道德规范，而是在个体走出封闭自我、进入共同经验世界的过程中生成的伦理自觉。

四、捍卫愉悦：对抗现代性的情感异化

从审美愉悦到共同体建构，再到伦理责任与公共精神，殷企平始终关注文学如何参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然而，在这一理论路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消费主义与技术理性不断扩张的时代，愉悦为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构成了殷企平近年来文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背景。从其学术历程来看，无论是早期对维多利亚文化批评传统的研究，还是后来对共同体、普通读者和共享愉悦的讨论，其核心关怀始终指向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换言之，“愉悦”并不是其研究中的偶然兴趣，而是其现代性反思不断深化的结果。要理解他为何重新讨论愉悦，也就有必要将其置于这一持续发展的思想脉络之中。

1　参见 殷企平：“英国文学中的共享愉悦与共同体形塑”，《外文研究》2（2025）：42。

殷企平对现代精神危机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他对 19 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研究。在讨论阿诺德（Matthew Arnold）时，他指出，阿诺德提出“文化”概念不只是为了建构某种审美趣味，更是为了回应工业文明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精神失衡。面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扩张与社会秩序的失范，阿诺德试图通过文化重建社会的精神基础，使文化重新成为联结知识、道德与情感的重要力量。[1] 对殷企平而言，阿诺德所面对的并非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现代社会如何维系人的精神完整性这一根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同样贯穿殷企平关于罗斯金（John Ruskin）、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和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研究之中。[2] 在这些维多利亚思想家看来，工业文明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却也导致人与自然、人与劳动以及人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断裂。罗斯金批判机械化生产对人的异化，莫里斯则试图通过“艺术地生活”的理想，重新恢复劳动与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殷企平特别关注他们对审美经验的重视，因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艺术并非供人消费的装饰品，而是抵抗人的异化、维护精神完整性的重要力量。由此，审美问题也就与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发生了深刻联系。正是在这一思想传统中，殷企平逐渐形成了自己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最深刻的危机，不仅表现为制度失衡或经济矛盾，也表现为情感能力的衰退与精神联结的削弱。消费主义文化不断鼓励即时满足和欲望消费，技术理性则倾向于将人的经验简化为效率、功能和可计算性问题。其结果是，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短暂的快感，却越来越难以体验真正意义上的愉悦；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日益频繁，深层的情感沟通却愈发稀缺。因而，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不仅是价值秩序的失衡，也是感受方式和情感结构的深刻变化。

在“愉悦”一文中，他特别批评了当代文化语境中对愉悦的误解。他指出，在消费主义逻辑主导下，愉悦逐渐被降格为感官刺激和欲望满足，并被纳入消费和娱乐机制之中；与此同时，一些理论思潮又不断将愉悦欲望化、政治化，进一步削弱了其文化和伦理维度。[3] 在这种背景下，重新讨论愉悦便不再只是对一个文学概念的辨析，而成为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一种文化回应。殷企平并未将文学理解为与现实生活相隔绝的审美空间。相反，在其关于共同体、公共精神和共享愉悦的讨论中，文学始终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在他看来，文学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提供暂时的心理慰藉，而在于激活个体的感受能力、想象能力与理解能力。通过阅读，人们能够突破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经验封闭，进入他人的生活世界，并在情感沟通与经验分享中重新发现人与人之间深层联结的可能。正因如此，文学不仅关乎审美经验，也参与着现代

1　参见 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81-85页。

2　参见 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19-130、157-172、196-210页。

3　参见 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外国文学》2（2024）：98-100。

社会情感结构的修复与重建。

从这一角度看，殷企平所捍卫的并不是一种狭义的审美趣味，而是一种维系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化能力。面对消费主义对于欲望的持续刺激和技术理性对于经验的不断简化，他试图重新发掘文学所蕴含的情感价值与人文意义。文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能够提供知识和娱乐，更因为它能够帮助个体重新获得理解他人、感受世界和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因此，对愉悦的捍卫本质上并非对某种审美趣味的维护，而是对现代社会情感能力的维护；并非对个人感受的强调，而是对人与人之间深度联结可能性的守护。在这一意义上，殷企平重新讨论愉悦，实际上是在重新确认文学的人文价值及其参与现实生活的可能。面对不断加速的现代社会，文学或许无法直接解决现实问题，但它仍然能够帮助人们保持感受世界、理解他人和关怀公共生活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代社会最为稀缺的精神资源。

结语：审美与伦理之间的批评建构

回顾殷企平近年来关于共同体、普通读者、共享愉悦与公共精神的一系列论述可以发现，“共享愉悦”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概念，而是其长期文学研究与文化思考不断深化的结果。从维多利亚文化批评传统到华兹华斯的共同体思想，从普通读者传统到文学经典问题，殷企平的学术探索始终围绕文学与人的关系展开。在这些彼此关联的研究中，“共享愉悦”逐渐成为贯通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支点。从审美愉悦到伦理关怀，构成了殷企平文学批评最具特色的建构路径。在其理论视野中，愉悦并非封闭于个体内部的私人体验，而是一种能够被分享和传递的情感经验。通过文学阅读，个体的审美感受得以突破私人经验的边界，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共鸣，并进一步通向共同体意识与公共精神。由此，文学不仅是审美活动的对象，也成为联结个体与他人、私人经验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媒介；审美与伦理、个体感受与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由此得到重新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殷企平既没有将文学工具化，也没有将其封闭于纯粹的审美领域，而是在坚持文学审美价值的同时，持续发掘其中蕴含的公共意义与伦理潜能。在此意义上，“共享愉悦”不仅是一个阐释文学阅读经验的概念，也是殷企平重新思考文学如何联结个体、共同体如何获得情感基础的重要理论尝试。它所呈现的，不是一种以批判为中心的文学观，而是以联结为旨归的人文主义批评立场。这或许正是殷企平文学批评最具启发性的思想价值所在。

Works Cited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7th ed. Boston: Heinle & Heinle, 1999.

Boyson, Rowan. *Wordsworth and the Enlightenment Idea of Pleas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2.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Eric Matth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Nie Zhenzhao.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205-206.]

Trilling, Lionel. “The Fate of Pleasure.” *Beyond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Learning*.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5. 57-87.

Woolf, Virginia. *The Common Read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5.

Wordsworth, William.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edited by David H. Richter.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7. 302-314.

Wordsworth, William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Lyrical Ballads*. London: Duckworth and Co., 1920. 125-131.

殷企平：《“文化辩护书”：19 世纪英国文化批评》。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年。

[Yin Qiping. *“An Apologia of Culture”: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3.]

——：“西方文论关键词：普通读者”，《外国文学》6（2019）：44-54。

[—. “The Common Reader: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6 (2019): 44-54.]

——：“英国文学中的共享愉悦与共同体形塑”，《外文研究》2（2025）：42-49+107。

[—. “Communal Pleasure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Foreign Studies* 2 (2025): 42-49+107.]

——：“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5）：78-84。

[—. “The Deep Community under the Pen of Wordsworth.”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2015): 78-84.]

——：“《爱玛》中的反讽与幸福哲学”，《外国文学研究》6（2025）：26-37。

[—. “Iron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appiness in *Emm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5): 26-37.]

——：“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东吴学术》6（2023）：26-34。

[—.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mmunal Pleasure.” *Soochow Academic* 6 (2023): 26-34.]

——：“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外国文学》2（2024）：89-103。

[—. “Pleasure: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24): 89-103.]

——：“走向公共精神：伊格尔顿的趣味观”，《外国文学》6（2022）：71-80。

[—. “Towards Public Spirit: Eagleton’s Views on Taste.” *Foreign Literature* 6 (2022): 71-80.]